



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

——新世纪诗歌的一种代际特征

□傅元峰

新世纪以来,诗歌研究界和很多诗人显示出较强的代际意识,较为常见的,是按照出生年代而将诗人划分为诸如“50后”、“60后”(又被称为“中间代”)、“70后”、“80后”和“90后”等不同代群,也有研究者以“朦胧诗”为中间点,将“朦胧诗”后的诗人统称为“第三代诗人”。这些划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突出、附加和强加了诗人之间的代际特点,并给很多诗人诗作贴上了不太恰当的标签,甚至成了一些诗人或诗歌群落谋求诗歌史认证的重要策略。这些现代汉诗代际划分的混乱局面,显然需要认真的清理与研讨。实际上,我以为诗歌的代际特征更多地是通过诗语来表现的。所谓诗语,是诗歌语体色彩、语言风貌和话语特征等的综合。在诗歌发展中,作为一种外显为建筑材料的诗歌元素,诗语有新旧更替的特性。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格局中,诗语的变革在语体、语言和话语等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也间接形成了诗美的差异,显现出诗歌这一文体发展的代际特征。

现代汉诗史上的诗语时代

近百年现代汉诗诗语变革的代际特征十分明显,至今已大致经历了四个诗语时代。而新世纪诗歌,已基本处于第四个诗语时代。每一次诗语变革,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交互期。新世纪诗歌诗语与第三代诗语还将有长期的共存,第三、四两代诗语的代际关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诗学话题。

现代汉诗史上第一个诗语时代是1917年到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这个时期,现代汉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试验。新诗是僵化的汉诗诗语求生的产物。在1917年前的诸多刊物上,古体诗被环绕在诸多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文章中间,并不和谐。胡适有文学改良“八事”之说,对古体诗中的“死字”也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16年就试写白话诗歌。1920年以后,新诗在各文学报刊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尝试集》出版后,各种诗集连续出版,诗社不断成立,专门的诗刊也开始出现。

第二个诗语时代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为现代汉诗诗语的成长期。从民谣风格的戏拟,到一本正经的创作,再到新的诗语终于在文本上正名,汉诗的新变在所有文体革新中显得最为坎坷曲折。在30年代,现代汉诗新的诗语逐渐从实验室走出,成功存活。这种面向传统的诗歌姿态形成的诗语存活,客观上支撑了40年代现代汉诗与域外诗歌密切的诗语互动,形成这个时期现代汉诗的繁荣格局。

第三代因文化地理格局的原因,显得较为复杂。就中国大陆而言,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为现代汉诗诗语的凝滞期。1949年以后的大陆汉诗发展历程是对40年代诗语培育成果的选择性继承,其主要脉络来源于红色诗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以及其他具有合唱风格的诗。在此基础上,有重新的锻造和打磨。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形成了在权威话语模式下对诗语的全面变革。其间诗歌的“地下写作”有一部分在1978年后获得了短暂的民间刊物的传播机会,在80年代经历了“朦胧诗潮”,又获得了正式刊物的刊发认可,成为80年代大陆现代汉诗美学崛起的基础。

在大陆现代汉诗的代际体系中,第四代诗人指那些逃离了二元对立的话语维度、在精神层次和诗美追求上获得了多元性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他们”诗群的形成标志)至今,形成了对第三代诗语格局的审视与疏离的意识,出

现了类似于坚、韩东、朱文、杨健、陈先发、蓝蓝、陈思楷等从“50后”到“90后”不等的一批诗人,他们的诗脱离了第三代诗语二元对立的、抗诉式的诗歌话语结构,又具有充分的语言意识,可指认为大陆汉诗第四个诗语时代的主要成员。

诗语重生中的代际相似

前两代诗语的代际关联,对新世纪诗歌的诗语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在现代汉诗诗语发展的第一、二代际之间进行区分,可以发现,第一代以语体和语言的变革为主,话语的成分稍显薄弱,诗美因抒情主体的层次单一而显示出单质的特征。这种变革体现了现代汉诗的诗语建设者们与传统诗学的对话——不是人文精神向度的对话,而是更加关注音律和语言,希望新诗的诗语能够在传统诗学范畴内找到存活的依据。朱自清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谋求新诗音律的合法化,周作人也不断提示人们注意与传统诗歌的融汇,不可一味做逆子。“浅草一沉钟社”延续的诗歌时代,“新月派”的诗歌追求过程,都在努力寻求诗语存活的文体身份。诗人们为了保存新的诗语能够生长,在音律甚至意象上都向传统有所妥协;第二代以话语变革为主,语体和语言的变革退到后台,抒情主体在诗语中得到了较为立体的复杂塑造,诗歌的哲思和知性因素明显强化,诗歌的音乐性呈现为更内在的音律,诗美也呈现为多维度的复合性。正是由于第一代诗人对古今汉诗渊源关系的密集梳理,第二代诗人对诗的心灵世界的深入勘探和呈现,使上世纪上半叶的汉诗能够在类似《雨巷》《蛇》《你是人间四月天》《也许》等诗中体现出汉诗本有的神韵,又能在类似冯至的《十四行集》和穆旦的《诗八首》等诗中借鉴其他语种诗歌的经验,开掘出汉诗诗语更为深邃的表意功能。

第一、二两代诗由单质诗语向复合诗语转变的代际关系,在第三、四两代之间有相似的运演,大致和20世纪汉语诗歌两次诗语重建,即“五四”时期的诗语重建和“文革”后的诗语重建有关。由于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具有复杂的诗语交互性,其间的代际关系和当下大陆的诗歌境况,也相应地变得十分复杂,有待细加分析。“朦胧诗”中具有意识形态反思能力的诗作,在话语倾向性上有较大转变,但在整体风格上仍体现为第三代诗语的平面性特征。处于三、四两代交替后期的新世纪诗歌呈现出两代诗语交叉共存的局面,就具体作品而言,诗美落差极大。近20年来,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迁施加于社会语言的影响十分明显,诗语在新的文化环境、特别是语言环境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诗人内在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出更多差异,诗人们在世俗情怀、历史观和精神境界之间的取舍差异也较为悬殊。

虽然诗歌从未像小说那样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明显差异性,但不同诗文在精神维度的区别一直较大,新世纪诗文中,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新世纪诗人居于何种精神维度写作,决定了他们更亲近第三代还是第四代诗语。就诗语体现出的诗美品质来说,可以将亲近于第三代诗语的诗概括为单质诗语,将第四代诗语界定为复合诗语。单质诗语多为单向度的抒情结构,语言、意象或象征手法上的丰富多变,甚至抒情者情绪的戏剧性,并不能增加诗歌的精神维度。它们的诗美特质非常吻合刘心武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单质的文学”的概念。而精神内涵丰富的抒情主体会在言说方式上体现出与单质诗语不同的话语特性,诗语也相应体现为复合诗语,这种“合金

的文学”与“单质的文学”的关系,是三四两代诗语最主要代际关系。

新世纪诗歌中的诗语杂陈

新世纪诗歌将在较长的时段内处理与第三代诗语的代际关系,单质诗语与复合诗语的杂陈将是这一代诗语的显见特征。但无疑,第四代诗语诗语将以诗歌精神内涵的丰富性为主要特点,诗歌精神内涵的开掘将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不难看出,精神的贫瘠和内涵的单一,已经成为新世纪诗歌诗语个性纷呈的瓶颈。虽然任何诗语成长都必须以最表层的技术修复为前提,但诗歌内涵的需求总会在最初阶段的诗语修复后被强化,这是现代汉诗百年来的发展规律。

单质诗语所塑造的抒情主体往往体现不出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而复合诗语则具有哲学甚至宗教的底蕴。比如,“行走”的语态在不同诗歌中有不同的诗语呈现:“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顾城《墓床》);“我并不在意裹紧人的欲望,/踏着积雪,穿过被赞美,被诅咒的喜悦,/恍若初次找到一块稀有晶体,在尘世的寂静深处,在陪审团的眼睛里。”(潘维《苏小小墓前》)。在这两首诗中,有两位孤独者,前一位的存在空间具有尘世与自我时空的多维特征;后一位孤独者则体现为单一的观念变更,抒情者与人群共居同一维度,虽然他对世俗观念的反拨比较坚决,但依然没有脱离简单的二元论格局。相类的区别,可以在新世纪诗歌中找到更多的例证。

单质诗语与复合诗语的内在区别在抒情主体。单质诗语的抒情主体,诗语典雅平顺,所有意象与意境的形成居于一个平面。在同一位诗人身上,往往具有自我重复的特征。如北岛、多多、欧阳江河、潘维、江非、郑小琼、李小洛等人的诗,皆具有单质诗语的特征,与第三代诗语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北岛、多多诗歌的文化阵营或文化类型意识以及精神立场的意识,一直左右着他们诗语的更新。历史主义加现实主义的审美惯性损毁了他们诗歌结构,即使旅居海外,也未能摆脱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养成的抒情程式。如北岛的《山谷》、多多的《居民》等诗,诗歌阐释的最终指向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观念。欧阳江河、潘维等人,在诗歌趣味方面有所拓展,但诗中一直有一位观念明确的抒情者,诗歌有明确的主题,抒情具有平面特征。《玻璃工厂》《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等诗,有华丽的意象和独特的音乐感,诗语富丽堂皇,精致的形式和新鲜的意象和象征经验,都让人叹为观止,但诗语的平面特征也一览无余。江非、郑小琼、李小洛他们更加贴近生活和细节,诗语中“及物”的成分增加了,但诗歌主体仍然以明确的观念为诗歌设立抒情边界。如李小洛的《偏爱》:“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左眼看报,左手写字/用左边的眼球积聚光线/夜里睡觉我也喜欢睡在/床铺的左边/像颗小个子的蚕豆,占据/黑夜最小的位置/每次走动,我总是先/跨出左腿”。每次停顿/我也是总向生活的左侧/看上去,我总像流过这个世界/一条左撇子的河流。”诗语的感性因素并不能掩饰其平面特征,类似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经验,在1980年代的校园诗歌中,也曾大量涌现。江非为人熟知的诗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肮脏的念头》《妈妈》等,也有清澈见底的主题,观念取舍在诗中高高悬挂,左右着诗语的秩序。郑小琼的长诗《完整的黑暗》更是带有抒情主体愤怒的情绪,诗语的新颖之处,全在于别出心裁的白描。在

■主持人的話

与我们以往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一样,在诗歌史的视野中来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也是傅元峰《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一文的主要目的。不同的在于,傅元峰是在代际变迁的意义上来进行诗歌史梳理的,虽然这也是诗歌史甚至文学史研究的常见方法,但是在傅元峰这里,“代际”的内涵完全不同于目前通行的以出生时间和年龄阶段所作的划分,而指的是更加切近诗歌本体的诗语特征,这便使他对现代汉诗的发展历程和对新世纪诗歌史特征的把握非常独特,同样也可能更加接近诗歌史和诗歌现状的本体。傅元峰将现代汉诗历时性地划分为多有渗透和互有交错的四个“诗语时代”,并且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正处于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的过渡阶段,具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与可能,我以为这对扭转我们以往近乎无奈地按照年龄阶段所作的代际划分,同时启发我们如何进一步地从诗歌本体的意义上来思考我们的诗歌创作和我们的诗歌史与诗歌现实,无疑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上述各种抒情中,诗语表现出的技巧因素,并不能有效拓展诗的表意维度。

而复合诗语则体现出抒情主体的哲学、宗教的自觉,生成深厚的情感底蕴,取消了诗语的单一维度和观念的方向,形成与单质诗语截然不同的诗美景象。这非常像小说人物塑造的“组合性格”或叙事的复调,在叙事中的多重叙事人,在诗语的表意系统中,则成为主体情感的多维指向。这类诗歌多没有明确的观念倾向,自我的边界意识晦暗,对人生属于历史区分的那一部分存在区域的兴趣不大。如陈先发的《丹青见》一诗:“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刺麻。如果/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溶化着。蛇的舌头如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诗中视点和视角经历了多次时空转换,而物象是相对恒定的。复合诗语的形成,其核心机制在于抒情者话语的变更,与抒情主体言说方式的选择和抒情主体言说的语言环境有关。视角转换的多维度构成了诗语的立体格局,在短促的诗行中,包含丰富多元的主体情绪,底蕴深厚,耐人玩味。

复合诗语是现代汉诗经历了两次诗语重建之后,两度面临的诗学问题。诗语的复合品质,与诗人的哲学和诗学素养有密切关系。新世纪诗歌诗语的复合化正经由两条路线前行,一条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坚、韩东等人践行,为被动的诗语重建;另一条则是具有语言天赋的新生代诗人们,他们本能汲取当代诗语背景的营养,先天获得了诗语革新的能力,体现出较为丰富的诗语气象,具有诗语重建的被动特征。宏观看来,无论主动的谋划,还是被动的本能获取,能够稳定呈现复合诗语的诗人很少。处于第三、四代际转换中的大陆现代汉诗诗人,还将在诗语重建中继续分化。毫无疑问,心灵最先丰富起来的诗人,将摆脱早期诗语重建的语体、语言单质追求,将多元和多维的诗美作为自己更高的诗歌追求,不断提升自己诗作的经典品质。

“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笔谈(十)

■新作快评

俞胜《宝奶奶》,《翠苑》2011年第4期

物质丰富 精神赤贫

□马振宏

物质丰富 精神赤贫

物质丰富 精神赤贫